

中国现代 知识分子的 历史轨迹

王金鈺／等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王金鈺／等著

中国现代 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

王金铭 等著

责任编辑：房海滨

封面设计：曲刚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5印张 6插页 424,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刷：延边新华印刷厂	印数：1—2,000册 定价：7.00元
	ISBN 7-5383-0789-3/G·737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探 索	18
一、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	18
二、“创造青春中华”	23
三、认识“强盗世界”	29
四、实业救国、科学救国	40
五、教育救国	54
六、关于中国社会出路的“百家争鸣”	66
七、社团的组合与分化	79
八、“走俄国人的路”	91
九、最初的反帝运动	102
十、投身国民革命	114
第二章 分化、徘徊、奋斗	127
一、革命知识分子的牺牲奋斗	128
二、第三条道路的开端	139
三、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	148
四、在国民党治下的参政	157
五、学者与“诤臣”	167
六、左翼文化运动	179
七、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189

八、社会出路上的“改途易辙”	200
九、社会教育的倡导与推行	210
十、“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主张	222
十一、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	230
十二、国难中的新觉醒	237
第三章 抗 战	254
一、保卫平津	254
二、保卫上海	269
三、保卫大武汉	280
四、走上不同的抗日岗位	291
五、投敌附逆的文化汉奸	308
六、“孤岛”的斗争	317
七、拥蒋抗日的不同态度	332
八、民主宪政运动	346
九、在国民党的控制和迫害中	362
十、黑暗岁月与进步文化	375
十一、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	391
十二、批判法西斯主义和在贫穷中奉献	403
十三、波澜壮阔的联合政府运动	411
第四章 解放和归宿	421
一、“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的幻想	421
二、为了和平与民主	430
三、在血泊中觉醒	442
四、第三条道路的破产	454
五、战斗在第二条战线	464
六、铁与血的最后的斗争	474
七、所谓新的第三方面	490

八、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497
结束语.....	510
后 记.....	523

引 言

旧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各层次的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总共不到500万人。大致构成是：各类中等学校(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毕业，或具有中学文化程度者，约400万人左右。高等学校毕业，或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25万人左右。其中国外留学者约2万至3万人。

20世纪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新式知识分子。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大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才形成新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来源于新式学堂、教会学校和国外留学。

1901年至1902年，清政府令各省兴办大学堂和武备学堂，1905年废科举，为数不多的新式学堂先后出现。民国建立后，兴办新式教育形成热潮。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立、省立和私立大中学校逐年增长。据北洋政府第五次教育统计，1917年全国高等学校有84所，学生19 823人。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出版的《中国教育统计概览》载，1922年5月至1923年4月，全国高等学校为124所，学生34 880人。此间，各类中学的发展也相当迅速。1915年全国普通中学有444所，学生69 770

人，1922年发展到547所，103 385人。1917年全国有实业学校475所，学生30 513人，1921年全国实业学校达842所，江苏、山东等省均有实业学校百所以上。^①

在以后国民党统治的22年中，各类学校又有进一步的发展。194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12年以前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为3 184人。1912年至1947年的35年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累计为210 827人，合计旧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为214 011人。这21.4万名大专毕业生，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同书资料统计，1931年至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类中学毕业生为2 140 337人。加上1912年至1930年全国中学毕业生（按当时在校生估计，当在100万以内）和1931年以后沦陷区和解放区的中学毕业生，合计1912年至1945年全国中学毕业生约400万人以上。这400万以上的中学毕业生，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基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派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开设学校。1899年外国人在华所办学校已有2 000所，学生400人。多数是小学，部分是中学，大学只有圣约翰大学一所，学生200人。^②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迅速发展，五四以前，外国人已先后创办了东吴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协和医科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20余所大学。1937年全国各类（大、中、小）教会学校学生有100万，其中大学生约8 000人，中学生约900人。^③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7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共31 188人，其中教会学校学生9 000人，占1/3。教会学校毕业生许多人又向往出国留学，1920

①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28、3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第82页。

年至1925年，教会大学毕业生有89.4%赴美国留学。^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如此规模的教会学校，不能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教会学校的影响很大。

20世纪前，清政府曾先后派学生留学欧美。总人数不超过200，影响不大。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国人惊慕日本的成就，大批青年东渡求学。20世纪初出现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留日学生最高纪录达8 000人（1906年）。^②以后清政府限制留学生资格，留日学生有所减少。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载，1901年至1934年间，日本东京帝大、第一高等学校以及其它几十所学校，共有中国留学生11 966人。

1908年，美国向中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商定中国每年派学生赴美留学，至退款用完为止。1909年至1911年考选三批留学生180人赴美。1911年清政府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从1911年至1929年，清华送庚款官费生、津贴自费生、特别官费生等1827人。^③各省也利用庚款选派留学生赴美。继美国之后，英、法、比、荷等国先后退还部分庚款，退款使用项目均包括选送留学生。在英国1922年至1945年退还庚款期内，中国政府先后派送九届官费留学生200余人赴英留学。^④

1915年蔡元培等组织勤工俭学会、法华教育会，“谋学生出国与谋工之便利”。1920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也有千余人，1921年领维持费的学生1 700人，后因经济困难，出国学员逐渐减少。1925年苏联在莫斯科创办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帮助中国培

①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第82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9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0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南京国民党政府《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5编杂录，第82~83页，1946年。

养革命干部，1930年停办。此间，进步青年纷纷赴苏留学，1926年至1927年留苏学生在500人以上。^①

20世纪初，清政府邮传部每年派送南洋(后改名交通大学)、唐山等专门学校优秀生出国留学。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继续选送，到1925年6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先后派学生600余人，赴英、比、美、日、德、俄等九国学习邮、电、路、航四政。^②教育部和一些大学也派留学生出国。30年代以后，留学生人数进一步增长。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第一次、第二次教育年鉴统计，1931年至1946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给出国留学证书者计7 115人。^③

五四以后30年的旧中国留学生，粗略估计，最多不超过3万人。留学国度包括欧、美、亚10余国，以留美、留日为最多。在现代中国不到500万的知识分子队伍中，两三万名留学生所占比重很小。由于他们居于知识分子上层，长期置身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和影响，掌握高层次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同国外有较多和较深的联系，因而这些人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相当大。许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科学家，均出身于此。

旧中国不到500万的知识分子，分属地主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四个不同阶级。依附地主买办阶级，在反动政权机构中分掌大小官职，为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效劳者是少数。本人是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分享利润者也不多。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自由职业，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追求资产

① 《莫斯科中山大学》，第79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留学史》，第115页，中华书局1927年版。

③ 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教育统计，第22页，1948年。

阶级民主，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机关、企业、学校等公私部门，靠出卖智力获得工资生活，身受三重压迫，失学失业，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到劳动阶级营垒，献身工农解放事业，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观察，如毛泽东所指出：“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①周恩来也明确肯定：“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②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也把广大知识分子划入小资产阶级。

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比，同帝国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比，同工农劳动阶级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其自己的特点。

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比：第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队伍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此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因而知识分子的数量和队伍规模，较之近代显著地扩大了。第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们先后瓜分中国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想灭亡全中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中国民族危机深重和国破家亡的过程，因此他们始终明确地把斗争主要锋芒指向帝国主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也曾前赴后继御夷救国，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但是，即使象孙中山那样的伟大人物和辛亥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3～604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② 《周恩来选集》（上），第21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的志士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前，也一直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第三，就队伍结构而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基本上由封建士人和具有资本主人倾向的知识分子组成，其中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极个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队伍，基本上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中国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近代中国所没有的。第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上层，多数长期留学国外，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比近代知识分子的视界要深远得多。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经过切身的体验，最早最深刻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因而有很高的反帝觉悟，成为民族的精英。一大批人，羡慕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醉心资产阶级民主，分不清帝国主义对中国是友谊还是侵略，因而不同程度地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少数人存在民族自卑感，同帝国主义勾结，卖国求荣，成为民族的罪人。这种情况，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少有的。第五，就职业结构而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基本上还是一元的，“科举之外无他业”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最理想的职业还是入仕当官，等而下之是设馆授徒。只有少数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先进分子，从事新式的新闻、出版、教育、科技等社会事业。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更多直接或间接地依附和服务于封建政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除了一小部分人读书做官，充当官僚、政客外，大多数人进入了教育、出版、新闻、科技、法律甚至实业领域。其上层，成为教育家、教授、出版家、作家、记者、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律师、工商业家、金融家以及少数政治活动家；为数众多的下层，充任了中小学教员，机关企事业小职员，以及其他受雇于公私部门或自食其力、收入微

薄、随时失业的脑力劳动者。这种情况规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较他的前辈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要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相对独立性。第六，社会贡献不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比近代知识分子更为重要、更为广泛的作用。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担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和骨干，其中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和参加了波澜壮阔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他们比近代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广泛地实现了科学技术的物化，奠定了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后，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异常激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在反动阶级的血腥镇压下，付出了比前辈们更为重大的牺牲。

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比：第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队伍形成于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多数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感。他们痛感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关心国家的命运，忧虑民族的不幸，矢志为祖国的强盛和民族的独立献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置身于毫无民主自由的中国，多数人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痛感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野蛮残暴，他们同情人民，追求民主，同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这种历史性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在一般情况下所没有的。第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短，人数少，知识结构低。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算起，到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200多年、十代人更替的历史，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不过50年和仅仅三代人的历史。包括初中文化程度在内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4.5亿人口

中所占比例，仅仅是1%左右。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更是极少。中学毕业生占了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95%，大学毕业生只是整个队伍的5%，国外留学者仅仅占0.5%。大学毕业生同全国人口比为两千万分之一，国外留学者为两百万分之一。据统计，1930年日本高等教育机关在学人数近20万，1945年近40万。^①人口超过日本6倍的中国，1930年在校大专学校学生37 566人，不到同时期日本的1/5，1945年为83 498人，为同时期日本的1/5强。^②又据统计，1930年全美国大专院校在校生为1 082 443人^③，同年超过美国人口3倍的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只有37 566人。1940年美国全日制大学生为1 400 000人^④，同年中国大专学校在校生只有52 367人^⑤。1928年至1930年，美国1 078所大专学校中，有教员71 722人^⑥，而同时期中国全部大学生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队伍之小，由此可以概见。第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科技力量相当薄弱。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加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科技人才的成长。据美国教育委员会报告，1920年至1930年间，美国全国有工程师16万人，按全国不到8 000万人口计算，每450人中，就有一名工程师。^⑦20年代初，中国约有工程师750名，按全国4亿人口计算，18.5万人中才有一名工程师。^⑧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旧中国取得重要成就的科学家屈指可数。

① 《日本之成长与教育》，台北开明书店1975年版。

② 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教育统计，第4页。

③ 《美国教育概览》，第12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④ 滕大春：《今日美国教育》，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 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教育统计，第4页。

⑥ 曹炎申：《美国教育》，第23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⑦ 同上。

⑧ 《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第13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同工农阶级比：第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直接接触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想敏感，易于接受和理解新事物。他们是不同阶级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充当了革命的先锋和桥梁，往往走在历次运动的前头，广大工农群众，则是中国革命主力军和基础。第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掌握较多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较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点，尤其是在实现科学技术的物化方面，是工农劳动者所不能代替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承担者，在思想、文化、教育、艺术各个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特殊地位，也是工农劳动群众所不具有的。第三，知识分子同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关系较远，同经济运动的联系不密切，政治上思想上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这种情况一方面规定了他们易于接受真理，向进步的方面转化；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动摇性和不稳定性。工农劳动者则不同，被压迫的地位逼使他们除了根本改变政治经济现状，别无出路，因而他们的政治立场较之知识分子要坚定得多。第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劳动方式、工资数量、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一般说来，同体力劳动的工农劳动者存在不小的差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上层，受过高等教育，职业被社会艳羡，收入可观，“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的”^①，同工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只有知识分子的下层，受雇于公私部门的小雇员、小教员，其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才同产业工人接近。第五，知识分子基本上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从事脑力劳动，同工农劳动阶级比，一般说来，缺乏感性知识，缺乏实践经验，脱离实际，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又多以个体劳动方式进行，个人奋斗，因而又往往缺乏群众观点，不易看到群众的力量，这又与工农劳动者有很大的不同。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长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与此同时，旧的地主买办阶级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在新旧力量的较量中，仍然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地位。在文化思想方面，五四以后，欧、美、日本近百年的思想一齐涌进中国。经过新陈代谢，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日益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但儒家的封建主义思想，仍然有其自己的阵地。这样的社会背景，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政治抉择的充分可能性。同一时期的严重民族危机，又使知识分子面临政治抉择的极大迫切性。但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有成长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能够统帅整个时代的强有力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较迟，20年代末30年代初犯过左右倾错误，在革命反革命的对峙中，又长期处于劣势；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相继掌握全国政权，对人民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统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不容易明确自己的依托，而易于游移不决、依违两可和怯步不前。

五四以后30年，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经历了三条不同的历史道路。

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热心社会改造，在激进民主主义者中，有少数人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迈出了适应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第一步。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探索社会革命论和唯物史观，鼓吹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成为现代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进步青年，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击和俄国革命的吸引，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找救国的真理，树立了崭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随即同工农群众结合，成为20年

代初中国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在革命实践中，他们中间的一些人，锻炼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的30年中，有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追随中国共产党，走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其中的多数人，历史地成为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只有少数人继续以科学文化服务于社会。但是在白色恐怖下，他们传播文化知识的社会职能受到极大的限制，反动派限制他们在科学文化上做出更多的贡献。以鲁迅为代表的少数杰出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但接受马克思主义较晚，开始还是在黑暗中孤军作战。当他们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行列，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旧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群。其中不乏忧国忧民服劳报国之士，由于阶级的限制和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社会联系的制约，他们不能很快地投身革命，而是不同程度地走了曲折复杂的道路。他们中间热心政治的一些人，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不赞成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之外，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三条道路。第三党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曾是探索这条道路的先驱。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中的不少知识分子，也是要在国共两党和革命、反革命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建立地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实，中间路线本来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立物，它一出现，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国民党反动派只要独裁专制，绝不允许民主，对第三条道路，也必除之而后快。中国现代史上搞第三条道路者，先后都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热心教育、科学的一些人，立志改造中国，但又不愿意卷入阶级斗争，试图在反动统治下，通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途径，拯救衰败落后的中国，殊不知，